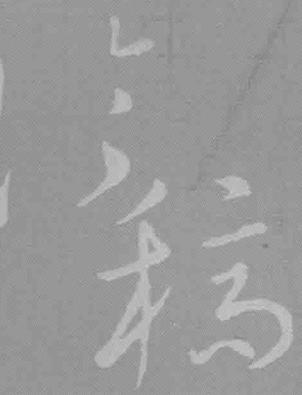


陈东有

文史论稿

CHENDONGYOU Wenshi lungao



陈东有

文史论稿

陈东有◎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东有文史论稿 / 陈东有著 —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 - 7 - 210 - 06637 - 8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中国经济史—明清时代—文集  
②文化史—中国—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F129.48 - 53②K248.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6183 号

陈东有文史论稿

作者:陈东有

责任编辑:游道勤

封面设计:揭同元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890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6637 - 8

赣版权登字 -01 -2014 -4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38.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东有**，男，1952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祖籍江西丰城。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初下放江西永修恒丰农场劳动。1984年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校任教；1990年1月获江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6月获厦门大学史学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化史、海洋社会经济史和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1995年、1997年先后破格评聘为副教授、教授。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走向海洋贸易带》《〈元曲选〉音释研究》《〈金瓶梅〉文化研究》《〈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正说〈三国演义〉》《济公系列小说评介》《人欲的解放》，编著《〈金瓶梅〉人物榜》（三册），合著《科教兴国论》等，主编《中国的农民》《现实与虚构》等。

2002年11月任中共南昌大学党委副书记；2003年5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2007年9月任常务副部长；2013年5月起任江西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自序

做学问，就是老老实实地学学问，学从问中来，问后才有学，才有得。

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4年大学毕业的学士学位论文《汤显祖〈庙记〉中的演剧艺术理论初探》，发表在1984年第3期的《江西大学学报》上。我的指导老师杨忠先生专门从事明清文学史的研究，是研究汤显祖的大师，我常去他家看书、请教。那时的师生关系与今天很不同，学生不仅能在课间与老师聊学问，还能到老师的家里去，翻看老师的藏书，甚至可以把书借走。因为老师和学生都住在校园里，下了课、星期天，都可以去老师家走走，在校园里散步，也可以经常见到老师。当然，最重要的，那个时候，读大学就是为了求知识、求学问，所以老师得到学生的尊重，学生受到老师的教诲。真可谓处处是课堂，时时得学问。我的体会，学问不仅仅是来自课堂，也来自于老师家中的请教，来自于课间的闲聊，来自于校园的相遇，当然，还有就某一个专题中的问题师生共同探讨。杨老师对我的这篇论文用心指导，对我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解疑释惑，使我能提前完成了论文的写作；而且他表扬我，说我的论文研究了此前人们不太注意的汤显祖的演剧理论问题，分析了汤显祖更为复杂的思想，他建议我到学报公开发表，他会向学报推荐。每想起此事，心中总有一种激动，感恩不尽，回味无穷。我的这篇论文，今天看来还十分幼稚，但是在当时，由于很快就被学报发表，对我鼓励非常大，我自信可以从事研究工作，从此，也就走上了研究明清文学史的学问之路。大学毕业时，我们这届分配很好，但我坚定不移地要求留校，留校虽然地位不高，工资不高，但有时间读书，有时间做学问。

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去研究《金瓶梅》，直到今天，还有朋友对我（而不是别人）研究提出困惑，甚者不解。我留校任教明清文学史，教学中学生的提问：你没有读过《金瓶梅》还可以来给我们讲《金瓶梅》？逼迫我不得不认真地阅读并

进一步研究这部争论最大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1987年,我开始研究《金瓶梅》中的官职现象,但在做了数千张卡片之后,发现自己学力不足,只得停下。我一方面又回到文学的领域,研究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发表几篇文章后,发现道德评判的漩涡太深,却又难以深入;一方面开始认真阅读明清史。在百般纠结中,我开始读出了《金瓶梅》的经济味。我没有系统学过经济学、经济史,却在研究此书的文化背景时,看到了当时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城镇及其市民文化对成书的决定性意义,于是我提出了“运河经济文化孕育了《金瓶梅》”这一命题,得到了包括江苏、北京、山东、浙江等一大批学者老师在内的同行、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因此,我带着包括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在内的《金瓶梅》命题开始参与到对这部小说的学术讨论之中。这一研究,不仅促进我在明清小说研究中有了自己的成果,而且也转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于是,我从“中国文学史”范畴的小说开始,涉足到“社会经济史”。

从“经济文化”的角度研究小说,会有创新的机会。但什么是“经济文化”,不一定能说清楚,这是我给自己的研究起的一个学问名词。1994年,当我被厦门大学历史所录取为史学博士生,向杨国桢导师求学问疑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学问基础应该是经济史,更全面一点,是社会经济史,即以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学理去探讨某一阶段历史问题及其规律,并以此来观察研究其他方面的问题。厦门大学的三年,对我的史学学术培养至关重要。我对历史一直感兴趣,原先读了不少的书,但作为一门学问,必须严格规范。其间,在导师杨国桢先生的指导下,我带着问题读书、看史料,参加学术会,参加学习讨论,外出田野调查。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学问,常学常疑,常疑常问,常问常新,常新又常学,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问导师,问同学,问同行,也问自己。当时,我是28岁读大学,35岁读硕士,42岁读博士。读博士时,问多了,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得问。弄得后来的师弟师妹不知我是教师还是学生。当我在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海洋社会经济史后,更感到自己加强学问、抓紧学问的紧迫感。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内陆地区的人来说,要研究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有很多学问的内容都是新的知识、新的命题。如果说从文学进入史学是一个跨越,那么从一般的社会经济史进入到海洋社会经济史更是一次大的跨越,非得认真老实地

学学问问不可。

学问是学出来，更是问出来的。学是老老实实地学，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要去想捷径、找捷径，捷径上的东西都是快餐食品，不仅没有什么营养，只能充一时之饥，而且还有害于身体，把自己的学风搞坏了，得不偿失。记得在1987年考上“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跟随罗元皓导师学“音韵学”，需要每天啃读音韵著作中的大量注音字例，去找感觉。而在研究《元曲选》“音释”注音字规律时，要做出上万张注音卡片。当时年近七旬的罗老师指导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一张卡片一张卡片地做，这个学问是“熬”出来的。问要不耻下问，有不懂，有疑惑才去问，被问者在你自己看来都应该是比你行的，那你还有什么条件，还有什么不好意思，还有什么面子、身价放不下来？不论人家如何回答、回答如何，对你都是有益处的。即使人家说他也不懂，那你就知道除你之外还有人不懂，说明这个问题更有必要去问，去研究；有了问，才会学无止境，才会越学越有兴趣，越学越想学，学出了人生的意义，学出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写到这里，又让我想到一个更重要的命题，一个更深切的体悟：通过学问做出来的学问，其实还不是全部的目的，学问的最终目标是在于自己个人的人文精神修养上，是在于自己的人格品位的铸炼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读书、悟书、写书、论书，不都是为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的体现和人格的完善吗？而这种完善，就是至善，厦门大学有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说的就是读书学问的过程和目标。什么是“至善”，内容当然十分丰富，有自己个人道德品格学问能力的修养，有对百姓民生的担当，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至于什么时候能达到“至善”？不知道。“至善”如同蓝天苍穹，望则有边，实则无垠，它值得我们不断努力，永远提升自己，这是每一个读书做学问的人一生的目标和追求。

记得读完博士回到南昌大学，有同志要我写一幅对联挂在教学大楼门口的立柱上，推却再三，恭敬不如从命，借前辈的佳句，吐自己的心志，把内心的感想表述了出来，与同学们共勉：

问学乃为养正气，  
读书不敢忘国忧。

如果要加一横批,那就是“止于至善”。这副对联至今挂了16年。

大学毕业快三十年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也快三十年了,学问之路其实是很艰难的,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何况我的学问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至于人文精神和人格品位的修养,还只是刚刚开始。我把自己三十年的学和问,选了若干,编成是书,分成两本,一本是关于《金瓶梅》方面的研究,一本是关于其他文学与史学方面的研究,请教诸位先生。

衷心感谢三十年来帮助和指导过我的各位老师、同仁,还有我的学生。

陈东有  
2013年冬于南昌西无斋

# 目 录

自序 .....	1
----------	---

## 文学类

中国近五百年文学中的平民文化内涵的确立与发展 ——兼论明中叶以降通俗文学的发展 .....	1
社会经济变迁与通俗文学的发展 ——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与发展 .....	6
汤显祖《庙记》中的演剧理论初探 .....	25
《元曲选·音释》研究(绪论及结论) .....	35
辛词艺术思维略论 .....	42
辛词艺术个性略论 .....	55
济公来龙去脉考 .....	63
“女书”起源与流传的文化特质 .....	74
《百城赋》说 .....	82

## 史学类

明清“抑商”二分说 .....	84
康熙朝米价中的商人行为 .....	99
雍正初年湖广盐价风波议 .....	115

---

略论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中外贸易带	129
政策与利益	
——鸦片战争前清代对外贸易中的朝廷与地方关系	141
明末清初的华东市场与海外贸易	166
明清时期东南商人社会业缘中的血缘关系	175
明清东南海商压抑心态初探	190
明清时期东南商人的神灵崇拜	200
试论明代后期对外贸易的禁通之争	213
论明清海洋经济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222
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	235
略论早期泉州海外华商对家乡的回报	244
浅论黄道周的“体用”精神	256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规定与通变	
——以江西景德镇瑶里镇程氏宗祠为例	263
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	271
附:陈东有论著、编著、论文主要目录	292
跋	298

# 中国近五百年文学中的平民文化内涵的 确立与发展

## ——兼论明中叶以降通俗文学的发展

### 一、中国古代文学与平民文化的关系

什么是平民文化？平民，即非贵族者、非权力者，又非奴隶非农奴者。仅就阶层而言，中国自西周时已有平民阶层，如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人”中的中下阶层，可以称作为平民阶层；如唐宋时期的农民（包括无权力的地主）、市民也是平民阶层；到明清，平民阶层则发展得非常快，不仅因为农民的绝对人口数增长加快，而且市民的人数增长更快，市民中的平民意识已经觉醒。平民文化就是建立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平民阶层基础上，具有与平民阶层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且能在社会中鲜明地表现本阶层要求的生存状态。平民阶层的形成是平民文化的基础，但是要形成平民文化，还需要在社会平民群体构成的基础上出现平民意识的觉醒。因此，上古时期有平民阶层，但平民文化还未形成；中古时期平民阶层有了发展，但平民文化并不突显。而到明清时期，平民阶层不仅大大发展，平民意识已然觉悟，平民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才会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研究纵贯中国古今文学发展的脉络中，有一个共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板块式地联结，而是多层板块在一个最基本的平台上进行交错式地兴衰接替，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成长，又有另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成熟，也有另一种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衰微。这个平台很像是孕育文学的土壤，有了这块土壤，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表现

得如此丰富多姿。这个最基本的平台就是粗朴却又内涵丰富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的文学体现,民间文化还不等于平民文化,它是平民文化产生的母体,因为民间文学中有着丰厚的民众情感和民众意愿。一种文学中要表现出平民文化,一方面需要社会平民群体的形成和平民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还需要文学对社会平民群体的构成和觉醒了的平民意识的认同。由此而论,当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一直是在民间文学的培育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当民间文学在它自己的发展中进入到它内在的平民文化成熟之时,不仅自己能够生动地表现出平民文化,而且在通俗文学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也与平民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血肉联系。平民文化也就能促进中国文学新的发展。

## 二、明清通俗文学中平民文化的特征

明清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形式上,是传统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相结合的结晶,而在文化精神上,则首先是平民文化发展的结果。

明清通俗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来自于当时较为发达的东部各省。

东部各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市民队伍的扩展使平民阶层得以迅速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平民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以城市市民、商贾和手工业者为主要队伍的城市平民的平民意识不仅觉醒,而且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不仅消费通俗文学,而且积极参与表现平民欲望的文学创作。明清通俗文学中的平民文化具有如下鲜明的时代特征:

平民形象成为通俗文学中的形象主体。

平民意愿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主题。

平民的经济行为和生活选择成为通俗文学主要表现的对象。

平民的审美趣味成为通俗文学优劣的评品标准。

平民的语言词汇成为通俗文学的语言的主体。

### 三、近代文学发展对平民文化的选择

中国的近代文化的急变,主要表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上。

中国文化发生变迁的过程中,新事物、新观念主要在平民阶层中发生了巨大的震荡,主要是平民阶层较为欢迎接受西来的异族文化,平民文化较多地受到了西学的影响。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与平民文化的关系,与明清时期文学发展与平民文化的关系表现特征不同的是:整个的文学在历史性的变迁中,不仅主动去选择平民文化,而且开始用平民文化来批判旧文学和旧文化。

近代文学的发展,一方面是脱离平民文化传统正统文学处于衰微状态,屡振不起;另一方面则是具有平民文化精神的新的通俗文学和新的诗歌散文的兴起和发展。近代文学发展中对平民文化的选择的结果是古典文学退出历史舞台和新文学的孕育。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文学主张成为近代文学发展中平民文化精神的代表,其文学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新旧文学转变的重要链接。代表平民文化的文学形式已不只是通俗文学,文体在革命求新,语体在更新而白话化,为平民文化呼吁的不只是平民自己,不只是平民知识分子,还有一批虽然不是平民,却有着强烈的平民意识并愿为平民文化奔走的知识分子。近代文学的主流实质上是文学开始平民文化化。这种文学平民文化化催促着一场新的更为重要的文学革命诞生。

### 四、现代文学中平民文化对传统文学的批判和继承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随着皇权统治的消退,随着平民阶层现代意识的觉醒,平民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主体和新的旗帜,虽然在社会理论和实践上,中国文化的主体仍然是传统的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宋明理学文化),然而,平民文化精神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了中国现代文学

发展的主要动力和主旋律。

这种批判是从以文学为工具来张扬平民文化而对传统文化发起攻势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进行不仅有了这种内涵,而且以此为自豪;到三四十年代,进而出现平民文化自身的内省,即自我批判,真是中国文学在完全平民文化的发展道路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文学发展史。从作品题材上说,革命文学、女性文学、城市文学、农村文学、知识分子文学、乡土文学、抗战文学;从作者来说,女性作家群、知识分子作家群、革命作家群、京派作家、海派作家;从文学地域上说,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岭南文学,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学中的平民文化的变迁、更新和丰富。

现代文学中平民文化又有与传统的平民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一面,即寻求平民自身利益,表达平民自我意识。传统诗词散文文学这些原本与平民有“隔”的文学样式再次远去。而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得到革新的散文在现代文学中再次整合,与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平民文化中的批判精神相结合,成为一种讽刺批判的锐利武器;整合明末小品文的特点,则成为很有特色的新式散文短篇。受到欧化诗歌影响的白话新诗更多的是表达平民文化的精神境界。小说戏曲这些最显平民文化特征的通俗文学,在更多的作家的劳动中,在现代的印刷技术和传媒的帮助下,成为了平民的文学、大众的文学。

## 五、结语

中国文学近五百年的发展史,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研究,也可以从多种动机去考察。但是文学的进步,最主要的是表现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的理性觉醒的进步,是在皇权专制重压之下平民权益觉悟的进步。文学自可不必去承担某种“遵命”使命,但文学的创作者与欣赏者在文学中被一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联结起来,并推动文学和社会都向前进,确是一件好事。这也是文学发展的又一规律。

平民文化在中国文学近五百年的最重大最深刻的变革发展中,不仅逐渐成为文学内涵的主体,成为文学选择的主要对象,成为中国文学从古代走向近代

和现代的土壤和主要链接；而且引导文学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推动传统文学完成从古代走向现代的变革。

（本文是2001年秋在上海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的发言提纲，后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

# 社会经济变迁与通俗文学的发展

## ——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与发展

中国社会的广袤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它的结构的多元性,而不可能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绝对模式社会<sup>[1]</sup>。中国文学历史的悠久与内涵的丰富,决定了它在自身发展中与纵向的社会阶段需要和横向的多元社会反映构成的阶段性特色和相对关系。我们不仅可以用魏晋时期动乱的中原社会照样孕育出文学的自觉时代那类史实来证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逆向特征,也可以用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起来的东部社会分娩出多彩的平民文学这类史实来证明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同向特征。文学是人的一种特殊行为结果,它虽然不像普遍的经济行为那样更具物质属性,仍不可缺乏其对物质的依赖。文学仅限于颇多“自我”意识的文化人小圈子中的时候,它似乎可以脱离物质的世界,自诩高雅,从而成为一种狭隘的精神寄托;当它突破文化人的小圈子,进入平民世界,它便与物质世界融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成了社会消费的对象。换句话说,当社会的经济发展使文学不再成为少数文人雅士独专的“雅趣”而转变成为大多数平民享用的“俗趣”之时,文学便在整个社会的大舞台上更为活跃地发展,显示出它更强的生命力。

### 一、明嘉靖后文化市场的构成

明嘉靖后文学的变异,首先就在于原本发源于平民社会的文学,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市场,文化人即使对它修饰加工,也是为了把它放回到这个市场中去,成为平民消费的对象。通俗文学这个概念,对此时的文坛发展更具有概括意义。什么是通俗文学?就是平民大众欣赏的文学,就是由于合乎平民大众审美

情趣而进入文化市场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

人明，文化市场的规模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规模化、城市及其市民阶层的扩大和文化消费观念的成熟，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而发展起来的。

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虽是在元泰定二年（1325）<sup>[2]</sup>，但全面疏浚并开始发挥巨大经济效益则是永乐年间<sup>[3]</sup>，直到清末。这期间虽然河道时浚时淤，时修时坏，但运河对中国东部经济和南北物质、文化交流的功绩不可抹杀。这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再加上以北京为枢纽的八条干线驿道商路<sup>[4]</sup>，构成了一个有利于商品流通交换的国内经济交通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级市场的繁荣<sup>[5]</sup>与正在走向海洋经济（世界性经济）的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开始碰撞，两者之间的推拉力促进了自十六世纪开始繁荣起来的中国海外贸易。虽然明清两代朝廷因种种原因不时采取禁海政策，但民间的海洋经济活动从未停止。通向东、西洋的航路始终有商帆往来，沿海从广州到泉州、宁波，从台湾到福建，从南直隶到北直隶（即从江苏到天津）的航路不断得到拓展。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交通网络密切相关的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城市和商埠集镇。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明代旧城市的扩展与新城镇的产生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工商经济是扩城或建城的主要原因，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工商的城镇，这些城镇在历史的进程中又因工商业的繁荣而不断地发展；其二，城市中工商市民的比率增大。

据考查，原来作为都市、府、州、县署所在地的大中城市和商埠，在明初至中叶，因其工商业功能而大有发展的有三十余座。明中叶始，又有二十余座城市发展起来<sup>[6]</sup>。发展较快的新兴城市，大部分位于华东及沿海地区，立于大运河畔和交通干线枢纽之地。明清之际由于战乱，不少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受到破坏，有的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但由于当时经济复苏较快，城市的重建也是十分迅速的。总的看来，明嘉靖前后发展最快的城镇位于运河两岸、长江中下游与东南沿海的口岸、商埠和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不仅出现了像天津、德州、临清、济宁这类以商埠起因的专业城市，也出现了江南盛泽、王江泾、乌镇、南浔这类以丝织业起因的专业集镇，并发展出了北京、江宁、杭州、苏州、广州、汉口、扬州、佛山八大工商中心城市<sup>[7]</sup>。